

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当代再造

——浙北党山雷公庙会考察

张祝平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06)

【摘要】 仪式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庙会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仪式性活动,有其特定的寓意、独有的程式和丰富的功能。现代社会剧变不仅对中国乡村传统仪式的形式外表产生影响,更给传统民间仪式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带来深刻冲击和改造。当下,政府部门对繁荣乡村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对民间仪式的强力介入与征用,为传统民间仪式的再造增添了强大动力。但是,在此过程中,传统民间仪式的文化本真性却日渐剥离,这必然使其原本的象征体系难以复存,形式也终将难以为继。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承,既要着眼于促进其内生的价值转换机制和能力的发挥,更要着眼于仪式文化合理精神内核的挖掘与弘扬。

【关键词】 传统民间仪式;乡村庙会;政府征用;现代性再造;境遇与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取向;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4)04-0128-08

仪式是指按一定的文化传统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集中起来的安排或程序^[1],它可以是“包括诸如宗教的仪式、世俗的仪式、世俗融于宗教的庆典、仪式与节庆、政治性仪式、市民的礼仪、私人仪式和集体仪式、旨在造反的活动与旨在集结的活动、参展的表演与仪式的表演、体育运动的仪式活动、季节性活动、节假日仪式等”^[2]在内的礼仪的总称。但是,“仪式与神话历来无法截然分开,无论是从历史发生形态的角度透视,还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解释中都是如此”^[3]。因此,仪式又通常被理解为是宗教背景中所进行的或具有宗教色彩的正式行动。从一定意义上看,人们对神秘的(或非经验)的存在或力量的崇拜,体现在思想的层面即为信仰,体现在行为的层面即为仪式。在我国,庙会是民间信仰仪式中最隆重的群体性活动,它集鬼神祭祀、商贸活动、文化娱乐、人际沟通于一体,源远流长,不仅成为了民间信仰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还是承载民间信仰活动的重要载体,并在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经济交流、文化发展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浙北历来是民间信仰活跃之地,自古物产丰富,经济文化繁荣,乡村庙宇林立,庙会数不胜数,庙会仪式和形态层出不穷、纷繁多样,并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促进了当地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影响至今。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势介入和宗教政策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浙北地区的庙与庙会经历了短暂的隐匿(亦或消逝)时期,而在近30年来,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发展、再造重生。然而,现代社会剧变不仅对乡村庙会这一传统民间仪式的形式外表产生了影响,更给其所蕴藏的文化内涵

【收稿日期】 2014-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民间信仰的当代变迁与社会适应研究(项目编号:11CSH035)”、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江青年课题”“祭祀政策、民间信仰、地域社会(项目编号:13ZJQN026YB)”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祝平(1975—),男,浙江龙泉人,副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民间信仰和农村社会问题研究。

带来了深刻冲击和改造,“在这表象的背后埋藏着民间文化与民族国家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①。本文试图通过对浙北地区党山雷公庙会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再造的考察,描绘乡村传统庙会的现实境遇和生存图景,探究以乡村庙会为代表的传统民间仪式的当代意义和发展策略。

一、雷公庙会:党山民众的传统信仰与仪式

雷公系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司雷之神,源于原始先民们对于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等自然物的崇拜。“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②,这是《山海经·海内东经》中有关雷神的记载。在传统农业社会,百姓靠天吃饭,在先民们看来,雷出现会带来万物复苏,消失则会使大地萧条,蛰虫匿迹;雷是雨来的征兆,而雨水是丰收的保证,也是水灾的祸首;雷巨大的响声,耀眼的光芒,劈死草木生灵的力量让人敬畏^③。因此,先民们对雷充满了恐惧与焦灼,幻化出了各种司管“雷”这一神秘力量与具有人性化色彩的天神——雷公,并成为天象崇拜的代表。党山一带民众的雷公信仰和祭祀活动由来已久。据相关资料显示,现党山镇域位于钱塘江南岸,原为钱塘江边的一片滩涂之地,是雷击多发区,周边百姓捕鱼为生,外出劳作常受雷击之害,房舍草木生灵等也因雷击而化为灰烬。为避其灾,百姓相邀共建庙宇,塑立雷公神像于其中,常年轮流祭祀,以祈求雷公保全村落百姓生命和财产,渐成群体性的祭祀活动。据《嘉庆山阴县志》,①“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多集会祭祀,供米稞(雷公稞),祈求雷神保佑一方平安”^④。又因“雷于天地为长子,以其首长万物与其出入也。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复入,入则万物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复出,出则万物亦出,此其常经也”^⑤。乡民们认为祖祖辈辈繁衍生息,家世日益富足安康,全是雷神的护佑与恩赐。于是,党山民众对雷公更是顶礼膜拜,崇信有加,远近村落信众也争相前往敬拜,祈福禳灾。

旧时的党山雷公庙会举办时间一般为3天,即农历六月廿二日、六月廿三日、六月廿四日,演戏、集市等在六月廿二日已陆续开始。因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日系传说中的雷公生日,庙会确定这一天为迎神出会之日,庙会活动高潮迭起,前往进香祈愿者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据村里老人回忆,这一时期的庙会活动主要有4方面的内容。1. 演戏祀神。戏开演前要先祭神,目的在于酬谢神的佑护,所演剧目多为地方民俗传统戏,主要是体现忠孝节义、精忠报国、解民倒悬、因果报应等主题,伴以歌舞、杂剧、鼓乐等形式,娱神娱人。2. 迎神出会。迎会分为水会与岸会,水会以船只游湖为主,在河中行舟迎神;岸会以陆地行走为主,在集镇主要道路上迎神,迎神队伍往往相沿数里,民间艺人在迎神队伍中边走边演^⑥。3. 集市交易。庙会这几天,四面八方的商贾携货而来,在雷公殿附近或迎神出会沿路,搭起竹编粘贝壳的凉棚,摆摊易货。四是要杂献艺。“从安徽、河南等地来赶庙会的商人或民间艺人,在庙会中会大显身手,有的戏猴子、耍蟒蛇;有的练大力士卖狗皮膏、看西洋镜”^⑦。至解放初期,党山雷公庙会仍如期举行,会期依然3天,人气不减,热闹依旧。“六月廿四这一天进行‘迎会’,来自各地各路队伍从雷公殿出发,在集镇内主要道路上行走。迎会队伍敲锣打鼓,肩旗打伞,有乐队吹拉伴奏的,有扮戏文的,有走高跷的,有玩杂耍的,有扮各种神灵的,有扮演三十六行的,有同道具服饰,披红挂绿,热闹非凡,一路相沿数里,深受百姓的喜爱”^⑧。后因国家宗教政策波动和社会动荡,庙会活动的负面因素被放大,党山雷公庙会逐步被改造成了区域性的“物资交流大会”。②至文革期间,雷公神像和庙宇被摧毁,党山民众的雷公信仰呈现断裂,传统庙会仪式随即消逝。

① 山阴县是浙江省绍兴地区历史上的一个旧县名,辖今党山镇域。民国元年,山阴县与会稽县合并为绍兴县。

② 1952年,党山供销社利用雷公庙会,举办了首次初级市场物资交流大会,在交流会上收购土布、萝卜干、干菜、杂粮等。在交流会举行的同时,“迎会”活动继续进行,此外还有地方剧团的演出、专题图片展览等。从1952年到1978年,共举办了17次物资交流大会,时间仍是每年的农历六月廿四日,这时正值农闲季节,赶庙会、逛交流会,充实了当地农民的休闲生活。1978年以后,物资交流会开始在秋季举办,取消了“迎会”活动,农民可以在交流会上买卖商品。因为到了秋季,棉花、络麻丰收后,沙地片农民口袋里都有了一定可支配的钱,成为交流会的主要资金来源。不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物资交流会于1988年停办。可参见邱芳:《党山——雷公庙会的前世今生》,《萧山日报》2007年5月23日。

二、文化艺术节：党山雷公庙会仪式的当代再造

(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党山

党山以山命名,位于杭州萧山区东部,与绍兴县仅一堤之隔,曾属绍兴县。镇域面积 49.74 平方公里,下辖 21 个行政村,1 个社区,目前有户籍人口约 4.4 万,外来务工流动人口约 3.6 万。“党山镇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镇域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工业经济发达,形成了以化纤织造、制镜卫浴、包装装饰、机械五金、蔬菜加工为主导的产业特色,全镇共有工商企业 600 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66 家,有国家级驰名商标 5 只、高新企业 6 家、省级技术中心 3 家、省级研发中心 1 家、省级博士后工作站 1 个,是中国化纤织造名镇、中国制镜之乡、中国门业之乡、中国卫浴配件基地、全国千强镇,浙江省百强镇、卫生镇、教育强镇、体育强镇,杭州市工业强镇、生态镇、新农村示范镇、文明镇、卫生强镇,萧山区经济发展十强镇”^[14]。“至 2012 年末,党山镇实现生产总值 62.2 亿元,工业企业产值 424.34 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248.45 亿元,财政收入 3.46 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 20 298 元”^[15]。2013 年 8 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杭州市萧山区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党山镇并入瓜沥镇发展小城市建设,组成瓜沥小城市,成为浙北环杭州湾区域又一超级大镇。

(二)党山雷公庙会的“复生”

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渐增强。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国各地民间信仰活动的迅速复苏和庙会活动的广泛兴起,在当地乡民的呼吁和文管站干部的努力推动下,党山雷公庙会获得了重生的契机。2004 年,党山镇党委政府组建了党山雷公庙会筹建委员会,决定重启党山雷公庙会活动,并于当年秋季庙会“复生”。然而,党山雷公庙会却已脱胎换骨,今非昔比。以下是萧山新闻网对此次庙会活动相关情况的报道。

2004 年 10 月,党山镇举办了第二届全民运动会、文化艺术节暨党山庙会。本次庙会包括庙会迎会、企业论坛、商贸会展、戏曲演出和全民运动会五大板块。庙会迎会仪式由 798 名人员组成的 24 支巡游队伍进行了踩街活动。企业论坛举行了“推行星级管理、促进二次创业”研讨活动。商贸会展共订出固定和临时展位 350 间,在 7 天时间里,共接待顾客约 7 万人次,成交额达 245 万元。会展期间的小吃一条街成了展会的一大亮点。戏曲演出共演出传统戏剧——绍剧、越剧和歌舞 19 场,观众达 27 000 人次;放映电影 10 场,观众达 12 000 人次;群益村出资邀请了绍兴樱家班、莲花落剧团,演出 3 场,观众达 3 500 人次。第二届全民运动会,全镇 40 支代表队的 1 585 名运动员积极报名参加了 10 个大项 42 个小项的体育竞技比赛。本次庙会持续时间长达 2 个月,吸引了近 13 万人次的积极参与,创造了党山文化活动的开展的新纪录。2004 年的党山庙会获得了“萧山区宣传思想创新工作二等奖”。^[16]

从这一年开始,党山镇党委政府决定将庙会作为党山镇的特色文化活动加以保持和发扬,并将每年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了 7 届。^①经过实地走访并查阅相关资料,“复生”后的庙会与传统庙会在名称、举办时间、地点、内容、核心环节、表现形式、民众参与方式、表达思想主旨等诸多方面都有了显著差别。这里,我们以 2012 年党山举办的已日臻成熟的第七届庙会与传统时期的党山雷公庙会做一个比较(见表 1)。

三、去神化与政府主导：党山雷公庙会重生的迷惘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逝而“复生”的党山庙会总体上是属于一个再造型的庙会,去神化和行政权力主导是这一再造型庙会的最显著特征。党山庙会因袭数百年前的“党山雷公庙会”,而如今党山无雷公神庙,也无雷公神像,庙会中更无神灵祭祀及相关活动,如此新型庙会会被当地媒体解读为是“传统文

^① 2004 年起每年的金秋时节举行,2008 年后决定两年举办一届。

化和现代文明交融后”^[14]生成的结果。党山镇党委《关于举办第七届党山庙会暨第四届全民运动会、文化艺术节的通知》中指出：“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集中展示党山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与时俱进的党山精神，打造党山对外宣传的金名片、经济展示的主平台、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全民同乐的大盛会，镇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今年举办‘和美·文明·幸福——第七届党山庙会暨第四届全民运动会、文化艺术节’。”^[14]可见，这一“再造型”的庙会被当地党委政府赋予了十分丰富的内涵和期许。在调查走访中，镇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也反复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的努力和美好愿景，即期望借助雷公信仰在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影响力、号召力，将庙会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新时代的语境、内涵和意义。

表 1 传统党山雷公庙会与“复生”后的第七届新型庙会的比较

	传统庙会	“复生”后的新型庙会
名称	党山雷公庙会	第七届党山庙会暨第四届全民运动会、文化艺术节 ^①
活动组织	区域内较有威望的热心人士和虔诚信众	镇党委、政府以及专门成立的领导小组和若干工作组
活动主题	祭祀雷公	围绕“和美·文明·幸福”，展示党山物质富裕新成果、精神富有新成就
活动宗旨	祈福禳灾、知恩报恩	1.突出乡土文化,推动传播精神文明； 2.将创新、创强与打造现代产业集群相结合,着力推进转型升级； 3.将素质提升与形象展示相统一,全力推进“经济强镇、宜居城镇、文化名镇”建设
活动时间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六月二十四日	每年秋季 9 月~10 月间 (第七届党山庙会举办时间为 10 月 16 日~20 日)
活动场所	以雷公庙为中心	镇中心小学、文化广场、文体中心、企业等
活动内容	1.演戏祀神;2.迎神出会； 3.商品交易;4.文化娱乐	1.艺术巡游;2.商贸展销； 3.文化艺术表演;4.体育竞技； 5.教育论坛
主要流程	筹备-庙会-神像归殿	镇人大确定-镇党委下发通知-动员-开幕式-庙会-闭幕式
核心环节	迎神出会	艺术巡游、商贸展销
经费来源	雷公庙日常功德收入、民间自筹	镇财政经费补助 ^②
民众参与	镇域内各村及周边村落远近信众自发参与	动员本镇各行政村、企事业单位组织村民、员工参与
社会影响	热闹非凡,深受百姓的喜爱	入选杭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名称重新改为“党山雷公庙会”

毋庸置疑，政府强大的动员力量和组织网络，是党山庙会得以启动再造和迅速“复生”的关键原因。事实证明，凭借党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党政主要领导对乡村文化工作的热情，依托庙会暨全民运动会、文化艺术节这种文化形式，自上而下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对于迅速促进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助推乡村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繁荣乡村传统文化艺术，乃至和谐干部与群众、企业主与员工、村际、社区、企业之间关系以及密切本地居民与外来创业务工者的社会交往，提升区域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确有其积极

① 据当地民众反映，2004 年镇里决定恢复庙会时，有人提议，为体现庙会的历史，延续传统民俗，应当继续沿用“党山雷公庙会”这一名称，但最终未被采纳。

② 党山镇人民政府专门制定下发了《关于完善基层组织参与庙会活动给予经济补助的通知》，其中对镇内各行政村、企事业单位组织参与庙会各项活动的补助标准、相关要求和补助结算方式等做了明确规定。

意义。然而,如前文所述,庙会因庙而生,是民间神灵信仰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承载者,神灵信仰是构成庙会诸多要素中的核心因子,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传统庙会才得以成百上千年延续。再造的党山庙会致力于“现代文明趋向”的改造,“去神化”的现代性意志使这一传统庙会的再造者们毅然地摒弃了所谓传统的神灵信仰与祭祀以及传统庙会仪式的核心场所——庙宇,这种再造的“现代型庙会”该何以为继?另外,民间仪式植根于民间,其生命力亦在民间,“反映和表达了当地人对人与世界的理解、解释和看法,并提示了他们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以及整体动作规范与秩序”^[17]。然而,党山庙会的再造总体上是基于行政权力对民众呼吁回应的一种表达,其动力主要来源于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广泛全面的动员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刺激。如此,政府的经济实力和主要领导的热情便成了这种仪式活动兴衰成败的关键。笔者在当地的调查访谈中,也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指党山庙会)都是镇政府在搞的,村里也会组织去……热闹是热闹的,不过每年也都差不多,我们在厂里打工也很忙的,有东西发就去一下。^① 仪式缺乏了信仰的支撑,参与者的内源力如何生成并得到持久的激发,这是党山庙会继续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做出有效回应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作为主办方的镇党委、镇政府也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再造后的党山庙会原定 2004 年起每年举办,而 2008 年起则改为每两年举办一届。在与镇里文化站工作人员的交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话语间所流露出的某种疲态和迷惘:“现在是越来越难办了,人和节目都不好组织。……镇里主要领导都换了,今年这一届(指 2014 年的第八届)还办不办,怎么办,都不好说。钱是不缺的……反正最后还是要看主要领导的(意见)。”^②

四、存留与升华:党山庙会仪式变迁趋势的讨论

美国人类学家柴普(E. Chapple)和孔恩(C. Coon)认为,仪式除去对个人的意义之外,对社会整体的意义也应得到强调^[18]。当然,这种意义并非物质化的固有的客观存在,它是被社会的、人为的赋予的,却又需要通过特定的基于“规约性”的象征符号和象征方式来表达和实现。乡村传统庙会仪式作为一种传统社会的“遗留物”,成为民间民众生活风俗的一部分,“在总体上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它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始终是被改造的对象”^[19]。去神化语境下再造“复生”的“党山庙会”,无神亦无庙,已然没有了原初形态及其象征意义。然而,“行为总是比思想更稳固”,人们尽管在果断地砸毁传统信仰,但在行为上依然存在着强烈的抵抗^[20]。事实上,深入考察党山民众的信仰实践,可以发现,从数百年前的雷公信仰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领袖神化,再到改革开放后民间宗教活动的悄然复生,尤其是基督信仰的勃兴,可以看出,对于神圣性的崇拜在党山民众的精神世界中远未消逝。2008 年,党山镇政府决定启动党山庙会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在此过程中,经当地民间民俗文化工作者的多番努力,又重新恢复了“党山雷公庙会”之名,并“围绕党山雷公信仰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研究、保护、开发、推介”等做足了文章,^③终于 2011 年党山雷公庙会成功入选“杭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俗类项目”。或许这就是这一传统民间仪式得以存留的最恰当理由。可以想见,在较长时间的未来,党山雷公庙会作为“非遗”的历史性存在,其“思维观念和肢体仪式共存互生,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操演,和经济理性对话,使传统在表层蜕变的同时,保持底层的延续”^[21]。

(一)远未消逝的神灵崇拜:党山民众的心灵世界

“从根本上说,所有的巫术和仪式等,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22]。在农耕时代,雷公信仰成为了维系党山民众心灵安宁和建构村落秩序的精神纽带,而雷公庙会仪式,则以神圣与世俗交融的方式促进了人神交流,帮助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减少忧虑并保持高度的信任和信心,保持一定的形式来应对现实”^[23]。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山迅速发展为一个工业化城镇,民众也经历了从蒙昧混沌到现代文

① 往年的党山庙会中,组织者都会给各项活动的参与者发放一些纪念品,如毛巾、牙膏等。笔者访谈时,当地民众如是说。

② 调查访谈时,党山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如是说。

③ 调查访谈时,党山镇文管干部如是说。

明的深刻洗礼。然而,这一社会剧变的过程,总体上还是在政府主导下展开的,而民众,尤其是原先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确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被动性,或者说是“被引入”现代社会的。他们对现代生活眼花缭乱又充满疑惑,迫切需要寻求心理的支点,于是传统民间信仰及仪式应运重生,成为了他们回味传统、又感知现在,并在其中寻找自身存在的文化纽带和精神力量。在党山,自“文革”期间雷公庙宇和雷公神像被摧毁后,至今一直未得以复建,2004年“复生”的党山庙会实际上也几乎没有传统雷公信仰的元素。换言之,在当下的党山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传统信仰复苏的显性表达。然而,党山民众对神圣性的崇拜和追求却一直未曾消失。从调查情况看,当下党山民众的信仰庞杂多元,其中基督信仰的勃兴是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具体表现为教会点增多、传播力量的增强和手段的多样化、信众人数的迅猛增长等;^①传统信仰依然活跃,在民间传统的佛道俗神崇拜中,送子观音、财神关公、大肚弥勒等是百姓日常最崇拜的神灵,因村中无庙,人们或到镇外的庙宇中进行祭拜活动,或在家中设立神龛日常香火祀之。当然,虽时过境迁,但雷公信仰还一直为众多的中老年信众所坚守,因为在他们看来:“雷公是祖先的保护神,也是党山这个地方的保护神,还是党山与别处不一样的地方。”^②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党山雷公庙会神性的游离与徘徊

“仪式绝不仅仅专属于传统的、前现代的社会,现代社会政治生活和权力的运作同样离不开仪式”^[24]。对于生活于传统社会的普通民众来说,民间信仰仪式是人们的生存方式之一,而在当下,对于政府而言,对于传统民间仪式的再造与征用,可以使之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成为一种政治实践。如前文所述,党山庙会再造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神性的游离,二是政府的自觉介入。去神化并未导致再造的党山庙会的迅即瓦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政府的强力主导,及其试图努力建构的政治文化与经济意义。党山庙会由传统社会中的民间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一方面当地党委政府通过其对话语的主导权,在再造的庙会中选择了对当下乡村社会政治文化发展有利的方面,突出了庙会“和美”的象征意义,突破原本为自己、家人和村落祈福禳灾的主旨,努力建构更高层次的文化目标——“文明幸福新党山”。另一方面,极力拓展和延伸庙会的商业意义,主导庙会的内容设置和场所设置,精心策划和设计商贸展销板块。除开展一般的商品交易活动外,还引入工业设计大赛、农业科技下乡与名优农产品展示会、海外高新技术行业对接会、汽车展等经贸活动项目,营造了浓厚的商业经济气息。当然,在庙会的各种展出和文艺表演活动中,现代技术和文化元素的大量引入和使用,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政府致力于将传统仪式引向现代的努力,这对于引领乡村民众融入和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无疑也将会是一种有益的促进。

可是,“如果仪式不具有一定程度的神圣性,它就不可能存在”^[25],“这是因为能够使它们成为膜拜对象的神圣性质并不来源于其自身的构造,而是信仰加在上面的”^[26]。其实,自从再造后的党山庙会“复生”以来,当地政府和民众就已整体性地表现出了一种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是一种文化惯性与新文化观念的对抗,其本质是从过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到目前反思过后的理性与非理性抉择的较量”^[27]。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照其中规定,民间信仰中的鬼神崇拜、信仰仪式及各种禁忌等应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五个方面内容”中的第四项,即“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和实践”^[28]。因为如此,我国众多的以信仰为核心的民间仪式成为了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以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在此背景下,并经当地民间文化工作者的积极努力,镇党委政府更加认定了传统庙会仪式在现代乡村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和经济意义,经过与民间的反复互动与斟酌,终于同意恢复“党山雷公庙会”名称,并成功申报入选。在申报材料中,对党山雷公庙会的历史渊源、信仰元素、对于当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的广泛影响、在当代的有效传承与弘扬以及未来的保

^① 2009年,杭州市萧山区党山镇有关部门完成了该镇人们基督教信仰情况的专项调查。调查显示,全镇共有信基督教人数3503人,占全镇总人数的8%左右。参见包成荣:《杭州市党山镇完成本地区人们基督教信仰情况调查》[EB/OL].佛教在线:http://www.fjnet.com/gdb/200907/t20090706_127152.htm,2009-07-06。

^② 调查访谈时,民众如是说。

护发展措施等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其中提出,要“合理吸取和保留传统民间仪式文化元素,反映传统乡村庙会的基本特征,从全方位、多角度地体现老百姓自己的传统节日。……使庙会真正体现党山的历史文化底蕴,使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文精神在此得到有机结合”^[20]。不难看出,政府与民间,在对待传统民间仪式的传承上尽管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都希望它能以正当性的方式继续存留,他们都既期待现代文明带来的更多便利,同时也在精心建构着他们的神圣仪式。

(三)乡村传统庙会仪式的正位与意义升华

“传统文化作为实质性传统,作为民族精神的内在要素和‘遗传因子’,可以保证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可以为剧变中的人民大众提供文化调适的精神依托”^[21],有效的文化传承对于构建社会记忆、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社会力量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传统社会的民间信仰仪式是促进人与神沟通的使者,是协调和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象征。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在文化的变迁中,凸显地域文化象征的传统民间仪式“由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转向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结并协调统一追求幸福和谐的象征,对当地社会起到了‘秩序化’的作用”^[22]。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信仰仪式,在以现代性话语和经济理性为主导的情境下,它的有效保护与传承发展的确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仪式内容的淡化,参与者‘扮演’意识的增强,临时制度的产生,都促使民间仪式从原有的‘精神’层面中走出,转换为文化‘游戏’。……也许我们保护下来的仅仅是‘仪式’,丧失的是‘精神’”^[23]。通过近些年来民俗文化保护发展实践,我们也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为地割裂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是不可取的,“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使用现代理性去消灭宗教,而是允许民间社会宗教纳入到现代文化中去”^[24]。因此,党山雷公庙会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既不能完全视之为历史的遗留物,也不能不看到蕴含于其中的传统文化基质有效存留的当代意义。

作为地域文化象征的传统民间仪式,是人们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历经漫长而广泛的社会实践形成,并在区域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的文化现象。如同“法律是立法者创立的特殊的和精密的制度,风俗与习惯是一个国家的一般制度”^[25],它的“存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可能由立法者的主观意志所决定,更不可希冀一纸法令即可废止”^[26]。近10多年来,党山雷公庙会仪式的“再造”与“做大”,在助推地方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比较鲜明地突出了地域文化的特征。现代党山庙会追求“和美幸福”的主题与先民们崇信“雷震而万物生”的百折不挠的乐观进取意志,可以被看作是这个地区的文化品格。这在普通民众的世俗生活中,或许具有其他文化形态难以比拟的亲合力、感召力、凝聚力和渗透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传统民间仪式的传承机制,总结提炼和培育发展蕴含于其中的文化精神,为美丽乡村建设服务还是一项当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此外,作为独具地域自然历史风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党山雷公庙会还具有资本化的巨大潜力。借鉴国外发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合理利用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打造属于本土的文化品牌,有利于推动地区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27]。同时,地域特色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也有助于“非遗”本身文化厚度的挖掘、保护、传承与发展,增强价值认同和文化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陈中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135.
- [2][3]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30.
- [4]张建军,汪俊.村落仪式与乡土社会秩序建构——读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J].社会科学论坛,2010,(12):199-202.
- [5]山海经全文在线阅读[EB/OL].<http://www.thn21.com/wen/Famous/hdnj/shan-13.htm>.
- [6]杨敏.明清传奇中的雷意象及其文化意蕴[J].戏曲研究,2003,(2):95-108.
- [7][15]邱芳.党山——雷公庙会的前世今生[N].萧山日报,2007-05-23.
- [8]何星亮.中国龙文化的重大变迁及其发展阶段[N].中国艺术报,2012-02-04.
- [9][14]崔竞雄.党山每年一次的雷公庙会[EB/OL].萧山网:http://www.xsnet.cn/2007_subject/yichang/bd5/360851.

shtml/2007-05-23.

- [10]蔡志龙.新农村文化散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92-93
- [11]邵福勤.缘起百姓对自然的敬畏——党山庙会的前世今生[N].萧山日报;2013-10-30.
- [12]葛蕾.城乡统筹进行时的“萧山党山样本”[N].杭州日报;2010-12-21.
- [13]萧山区经济发展十强镇——党山镇[EB/OL].萧山区政府信息公开网:http://xxgk.xiaoshan.gov.cn/jggk/dqgk/201303/t20130327_256932.htm/2013-03-27.
- [16]中共党山镇委员会.关于举办第七届党山庙会暨第四届全民运动会、文化艺术节的通知(党委[2012]41号)[Z].2012.
- [17]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0.
- [18]王易萍,崔雁鸣.去神圣化:桂东南乡村社会的道公研究——以贵港市木梓镇为个案[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65-71.
- [19]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1996,(2):108-113.
- [20][22][27][31]刘锦春.仪式、象征与秩序——对民俗活动“旺火”的研究[D].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122,5,121,116.
- [21]纳日碧力戈.各烟屯蓝靛瑶的信仰仪式、社会记忆和学者反思[J].思想战线,2000,(2).60-64.
- [23]李向平.信仰如无法制,精神必定走私[EB/OL].佛缘网:<http://www.foyuan.net/article-125690-1.html>/2009-06-06.
- [24]郭于华.陕北骞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EB/OL].三农中国网:http://www.snzg.cn/article/2008/0322/article_9558.html/2008-03-22.
- [25][26][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1-42,452.
- [2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6-05/17/content_350157.htm/2006-5-17.
- [29]党山镇政府.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书[Z].2010.
- [30]高丙中,纳日碧力戈.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14.
- [32]郑工.对民间仪式性文化活动的保护建议[EB/OL].深圳新闻网:http://www.sznews.com/art/content/2006-08/10/content_233632.htm/2006-8-10.
- [33]朱炳祥.村治权力与仪式变迁——以周城白族火把节为例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考察[A].徐杰舜,周建新.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21-233.
- [3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10.
- [35]范进学.认真对待习惯权力[N].法制日报;2002-05-12.
- [36]陈美华,陈东有.英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63-67.

(责任编辑 贺卫光 责任校对 李晓丽)